

# 朝圣路上的文学姻缘：钱锺书的文学翻译思想\*

熊辉

**【提要】**钱锺书的翻译思想集中体现在翻译境界和翻译功用两个方面，其“化境说”给文学翻译设置了最高境界，给译本设置了最高标准，最终起到提高翻译质量的效果；其“媒诱说”认为翻译的功用是让读者对外国文学产生兴趣，从而使中外文学达到交流和借鉴的目的。二者在钱先生的翻译思想中看似矛盾实则协调统一，是合理的翻译理论。

**【关键词】**钱锺书 文学翻译 “化境说” “媒诱说”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2)06-0108-06

钱锺书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和作家，其丰富的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早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但钱先生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中有独到的建树，学界对此多有涉猎却很少专门论述。目前已有钱锺书翻译思想和翻译美学的相关成果，谈论他的翻译境界和翻译功用也不再是新鲜话题，不过对钱先生在提出较高翻译标准的情况下却对讹化的翻译行为和走样的译本给予肯定的矛盾行为，至今没有人给出合理的解答。有鉴于此，本文以钱锺书两篇谈论翻译的文章《林纾的翻译》和《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为依托，论述他的文学翻译境界之“化境说”和文学翻译功用之“媒诱说”，以及二者如何圆满和谐地构成了钱先生翻译思想的主要元素。

## 一、文学翻译境界：行走 在朝圣的路上

“化境说”可视为钱锺书关于文学翻译标准的扼要概括，也可视为其给文学翻译设置的最高境界，并相应提出了原文是评价译文的标准。很多学者包括钱先生本人认为要在翻译过程中真正实现“化”是不可能的，他提出该标准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译者能够像教徒一样永远行走在朝圣的路上，对翻译行为和原作抱有虔诚

的态度，尽可能使译作因接近和忠实原文而趋于完美。

在我国翻译理论的建设过程中，翻译标准是学术界一再探讨却没有定论的话题。从汉代的译经活动算起，翻译在我国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而翻译标准问题似乎也顺应了刘勰“文变染乎世情”的思想，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诠释。抛开现代翻译史上的直译和意译之争，仅就当代翻译文学理论而言，傅雷在1951年提出了文学翻译的“传神论”标准：“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神似而在形似”。<sup>①</sup>他把“意似”——译文同原文在内容上的一致性——视为翻译的最低标准，以为如果译文能在形式和精神上同时一致，即达到了“神似”，才可能产生最佳译作。傅雷提出的“传神论”标准看似很好地解决了意译和直译的不足，但要真的实现译文与原文的神似却是不可能的，就连傅雷自己也说：“‘神似’和‘形似’不能同时兼顾，我们应大胆地摆脱原文形式，

\* 项目来源：重庆市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中国诗人与翻译”，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诗歌的文体建构”（批准号10FWW005）。

① 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8页。

着意追求译文与原文的“神似”。<sup>①</sup>从中不难看出，傅雷的翻译标准在早先的直译和意译的天平上偏向于意译，对译文在形式上保持原作风格依然不利。20世纪60年代中期，钱锺书提出了“化境说”，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sup>②</sup>在针对翻译过程提出“化境说”的基础上，钱锺书对理想译文作出了界定：“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sup>③</sup>有学者将傅雷和钱锺书的文学翻译标准进行了比较：“‘化境’是比‘传神’更高的翻译标准，或者说是翻译的最高标准，因为‘传神’论要求的‘神似’实际上是译文与原作精神上的相似或近似，而‘化境’则要求译文与原作在除了文字形式以外的所有方面相等一致。这的确是翻译的理想，是每一位翻译工作者和学习翻译的学生的努力方向。”<sup>④</sup>此话对钱锺书翻译思想的肯定并非人为拔高，钱先生自己非常赞同译作是原文“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的观点，要求译文除了书写媒介（文字）的差异之外与原文几乎如出一辙。

然而，结合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外在干扰因素和跨语际交流中客观存在的文化间的“不可规约性”，我们发现钱先生的“化境说”以及由此产生的理想译本与其说是翻译的最高标准，毋宁说是翻译的一种“理想”和“方向”，除了化境说，还有哪种标准能使译文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呢？如同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代表诗人瓦雷里提出的纯诗理论一样，连瓦雷里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一向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达到的目的，而且现在还是这样看，诗永远是接近这个纯理想境界所作的一种努力。”<sup>⑤</sup>也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中提出的纯语言（Pure language）概念：翻译语言“不再意指或表达任何东西，而是就像那不可表达的、创生性的太初之言，在所有语言中都有意义。”<sup>⑥</sup>译者总是为了接近这样的语言而不断努力着。同样，钱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sup>⑦</sup>“化境说”也是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无限接近却永远达不到的标准，翻译者无论怎样努力也只能行走在“朝圣”的路上而无法跃上理想的峰巅。辜正坤先生对钱锺书“化境说”的评价也许较为客观：“把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定为化境有其极深刻的一面，但又要记住这是一种最不切实用的标准；若无具体的标准与之相辅而构成一标准系统，则它只是一种空论，无大补于具体的翻译实践。”<sup>⑧</sup>事实上，中国佛经翻译的“文、质”说，严复的“信、

达、雅”说，鲁迅等人的直译法，赵景深等人的意译法，郭沫若的“风韵译”，傅雷的“传神论”以及钱锺书的“化境说”等翻译标准或方法虽各有不足，但它们各自的合理性却不容忽视，在不同的情况下译者虽会侧重于某一种翻译标准，但理想的译作总是各种翻译方法和翻译标准共同作用的结果。钱锺书提出“化境说”的目的不是要抛弃现实因素去追求绝对的忠实和对原作风味的完全契合，而是希望每一个译者像朝圣者那样仰望远处的“神山”——原作而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去从事翻译，尽可能地到达那理想的“圣境”，翻译出与原文相映成趣的译文。

与翻译的最高境界“化境”相应，钱锺书提出评价译文的最高标准应该是原文。钱先生在论述汉译第一首英文诗《人生颂》的时候，引用了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的名言“诗就是在翻译中丧失掉的东西（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和摩根斯特恩（Christian Morgenstern）的定论“诗歌翻译只分坏的和次坏的两种”（Es gibt nur schlechte Übersetzungen und weniger schlechte），旨在说明任何翻译文本（尤其是诗歌）相对于原文来说都显得“蹩脚”而不够贴切，由此他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一个译本以诗而论，也许不失为好‘诗’，但作为原诗的复制，它终不免是坏‘诗’。”<sup>⑨</sup>在钱先生看来，翻译活动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复制”行为，评价译作的最高标准不是译文是否具有卓越的形式风格或附加的情思，而是看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原文。钱先生在此论证的只不过是一个近乎公理的关于翻译应该忠实原文的言论，毕竟“所有的翻译理论——无论是形式的，应用的，还是编年的——都仅仅是一个

① 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8页。

②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96页。

③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96~697页。

④ 冯庆华：《实用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⑤ 瓦雷里：《纯诗》，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⑥ 本雅明：《译者的任务》，陈永国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⑦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98页。

⑧ 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1页。

⑨ 钱锺书：《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新华文摘》1982年第4期。

单一的、不可规避的问题的变体。怎样才能或者说才应该做到忠实?”<sup>①</sup>中国自汉代以来的佛经翻译以及西方自《七十子希腊文本》以来的《圣经》翻译,包括在全球化语境下不断升级的各领域的翻译交流活动,其实人们对之作出的经验总结或理论升华都涉及到翻译文本对原文的忠实性问题,钱锺书先生的论述也不离其宗。

译语与原语之间客观上存在的差异决定了译本不可能完全忠实于原文。无可否认,正是各种语言之间在隐喻意义上的对等关系,为翻译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一种假想的未被经验证明的可行性基础,人们总是认为各种语言是相通的,而且在一种语言中自然而然地存在着另一种语言的对等词汇。由此形成的跨文化比较的典型意图就是尽量去证明“人们在形成有关其他民族的观点时,或者是为其他文化同时(反过来)也是为自身文化整体的同一性设置各种话语的哲学基础时,他们所依赖的正是那种来自双语词典的概念模式——也就是说,A语言中的一个词一定对等于B语言中的一个词或词组,否则的话,一种语言就是有缺陷的。”<sup>②</sup>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可以作为真理一样存在的东西背后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它的产生并非实践经验的结果而是一种先入为主的假设,除了与欧洲语言所具有的权力相关外,也关系到西方语言哲学话语中关于翻译和差异问题的某些由来已久的假设,即在非欧洲语言中一定能找到与欧洲语言对应的词汇,否则非欧洲语言便是不完善的。这种假设对等关系的破绽很容易被识破,毕竟很难有两种不同的语言所对应的词汇能够相似到可以充分描写相同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现实,不同的语言在各自建构起来的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会只是表面形式的“独特或者怪异”,而其本质也必然存在差异。就如叶公超所说:“严格说起来,任何翻译没有与原本绝对准确的。我们都知道,文字是思想与智慧的表现,有哪一种的文化便有一种的文字。若是要输入一种异己的文化,自然非同时输入那种文化的文字不可。……每个字都有它的特殊的历史:有与它不能分离的字,与它有过一度或数度关系的字,以及与它相对的字。这可以说是每个字本身的联想。因此,严格说来,译一个字非但要译那一个而已,而且要译那个字的声、色、味以及其一切的联想。实际上,这些都是译不出来的东西”。<sup>③</sup>后来季羨林先生也认为翻译时要完全找到两种语言的同义词是不可能的,这同时也决定了译诗很难具有原诗的排列美和音韵美。“翻译一篇作品或者一段讲话,必然涉及两种语言:一种是原来那个作品或者讲话的语言,德国学者称之为 Ausgangssprache(源头语),英美学者称之为 Original 或 Source language;一种是译成的语言,德国学者称之为 Zielsprache(目的语言),英美学者称之为 Target language。

二者之间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差距。因为,从严格的语言学原则上讲,绝对的同义词是根本不存在的。”<sup>④</sup>因此,认为译文是原文的“复制”或抛开语言文化的差异单纯地追求译本对原文的忠实都有悖常理。

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范式的介入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美国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认为当前的翻译研究不再以语言学研究为主要方法,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sup>⑤</sup>从而引起了翻译研究内容的革新,“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产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影响,莫过于70年代欧洲‘翻译研究派’的兴起。该学派主要探讨译文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以及译文对译入语文化中的文学规范和文化规范所产生的影响。近年来该派更加重视考察翻译与政治、历史、经济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sup>⑥</sup>翻译文化学派观点使人们开始对翻译文学文本的外部环境产生了兴趣,于是译本在译入语语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以及它对原文的背叛是否合理,就进入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任何翻译活动都会受到诸多社会现实的影响,澳大利亚著名学者皮姆(Anthony Pym)近年来致力于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翻译,他在《翻译史研究方法》(Method in Translation on History)一书中所凸显出来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强调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翻译,突出翻译与整个社会诸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sup>⑦</sup>从翻译文化批评的角度出发,译者的审美取向、译语国的文化环境、“赞助者”以及接受者等等,都会成为使译本偏移原文的牵制力量,使译本与原文的差异成为一种必然的常态,也即是说“在翻译中,创造性叛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sup>⑧</sup>法国著名学者福柯(Foucault)的权力/话语结构模式,对研究译文与原文的关系提供了更为开阔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福柯在他极具影响力的著作如《知识考

①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宋伟杰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页。

②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宋伟杰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页。

③ 叶公超:《论翻译与文字的改造——答梁实秋论翻译的一封信》,《新月》(4卷6期),1933年3月1日。

④ 季羨林:《翻译》,《季羨林谈翻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⑤ 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

⑥ 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页。

⑦ 李德超:《翻译史研究方法·导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⑧ [美]韦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页。

古学》、《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权力与反抗》乃至《性史》中显示出权力运作最明显和最复杂的地方是其所强调的话语，因为在他看来，“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sup>①</sup> 翻译实践活动的展开必然受到一定社会历史境遇的影响，尤其是发生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权利关系的影响，很多时候，由于译者或译语文化所处的中心和强势地位决定了他们对翻译的操控，译文很难真正做到对原文的忠实。因此，如果我们有了对译本“危险处境”的认识，就不会再以原文为标准去单纯地要求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偏离甚或改写原文的翻译行为也可能成就上佳的译品。

钱锺书先生既然认为评价译本的标准应该是原文，译文不可能有好的或者更好的区分，而只有“坏的和次坏两种”，这实际上是忽视了翻译活动的特征而单纯地追求纯粹的没有现实羁绊的翻译行为。根据前面的论述，钱先生所谓的理想译本几乎不可能在翻译实践中产生，就连他本人也不得不说：“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不免有所遗失和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sup>②</sup> 既然如此，那钱先生为什么还要提出原文是译文的最高标准呢？针对中国现当代翻译史上不断出现的滥译行为，很多译本连原文最基本的内容都无法传达，更别说在译文中追求原文的形式和风格了，钱锺书先生力图提高翻译质量的良苦用心再次得以呈现。他将原文作为译文的最高标准，希望译文像原文的“复制品”那样忠实于原文，目的是要求译者尽可能地以原文为目标，翻译出尽可能忠实的译文，而不至于频频出现“豪杰译”的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钱锺书看似不合理的翻译标准对肃清译坛的不良风气大有裨益。

钱锺书先生将“化境”作为翻译活动所应达到的最高境界，将对原文的忠实度作为评价译文的最高标准。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分明发现钱先生追求的境界和提出的标准在具体的翻译活动中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目的是希望译者永远都像朝圣者那样不断提高境界和修养，最终翻译出相对理想的译文。

## 二、文学翻译功用：缔结文学的姻缘

钱锺书先生没有因为理想翻译境界的难以到达和理想译本的不可求而断然怀疑文学翻译存在的合法性，相反，他认为翻译而且很多时候“讹”的翻译对民族文学

而言是必需的补足。这就出现了理想与现实、标准和实践的矛盾，二者是如何在钱锺书翻译思想中得以统一的呢？除了前面论述的原因之外，也与钱先生对文学翻译功用的认识分不开。

一般人认为文学翻译在民族文学步入黯淡和萎靡境地时，通过引入外国文化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带来清新之风；通过消除语言隔膜让译语国读者领会异国文化风情和精髓，进而在宏大的文化比较视野中体认到本民族文化的发展路向。中外文学发展的历史说明，要使一国文学朝着符合时代要求和民族审美的方向继续前行而“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sup>③</sup> 奥克泰维欧·派茨（Octavio Paz）曾这样论述了翻译诗歌对译语国诗歌的促进作用：“西方诗歌最伟大的创作时期总是先有或伴有各个诗歌传统之间的交织。有时，这种交织采取仿效的形式，有时又采取翻译的形式。”<sup>④</sup> 我国现代著名的翻译家郑振铎先生把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和创作看成是文学家“两重的重大责任”，并认为翻译文学是民族新文学和新文体建立的基础：“无论在哪一国的文学史上，没有不显示出受别国文学的影响的痕迹的。……威克利夫（Wyclif）的《圣经》译本，是‘英国散文之父’（Father of English Prose）；路德（Luther）的《圣经》译本也是德国的一切文学的基础。”<sup>⑤</sup> 以中国文学为例，正是翻译文学将外国文学的形式、语言、表达方式和新思想等直观地呈现给了国内读者和不谙外语的创作者，才为新文学创作在民族传统之外另辟蹊径，走出了晚清以降诗歌创作举步维艰的泥沼。

译作在客观上的确对民族文学的新变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但事物的演变更多地取决于自身内在的演化。钱锺书先生认为译文更重要的作用是引导人们去认识并逐渐建立起对外国文学的兴趣，翻译是在为译入语国读者和外国文学之间缔结文学姻缘。结合钱先生的论述，我们姑且将其翻译功用观概括为“媒诱说”。此翻译功用观的建立与钱锺书认识到译文本身存在着瑕疵有关，人们不能将阅读译文视为在阅读外国文学，也不能通过译文去建立对外国文学的认知，“做媒似的”译文仅仅是

① [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8页。

②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96页。

③ 季羨林：《我看翻译》，《翻译思考录》，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④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页。

⑤ 郑振铎：《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改造》杂志（3卷11期）1921年7月15日。

让我们建立起对外国文学的初步印象后，再亲自去阅读原作，即他所说的译文的“媒”的作用。就像人们在认识恋人的时候，不能单凭媒人的一面之辞就定格对方的形象，最重要的是通过媒人或真实或虚假的介绍后，我们有兴趣和好奇心去和对方面对面地交谈，从而领略到“庐山真面目”。因此，钱锺书先生说：译文“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姻缘’。”<sup>①</sup>这与上世纪20年代郭沫若“翻译是媒婆”的认识有一定的差异。1921年前后，李石岑主编《学灯》的时候曾在同期刊物上发表了四篇文章：第一篇是周作人译的日本短篇小说，第二篇是鲁迅的《头发的故事》，第三篇是郭沫若的《棠棣之花》，第四篇是茅盾译的爱尔兰独幕剧。在编排这四篇文章的时候，《头发的故事》被排在译文之后，郭沫若对此感到不平，因而发出了“翻译是媒婆，创作是处女，处女应该加以尊重”的言论。<sup>②</sup>无论是希望新文学界有更多的人从事创作，还是要抬高翻译的中介作用，郭沫若的“媒婆”说都侧重于翻译的介绍和“引入”功能，翻译建立的是民族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关系。而钱锺书的“媒”更侧重于翻译“诱”的功能，即诱使人们自己去阅读外语原文，翻译建立的是读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这即是钱先生关于翻译功能的“媒诱说”。他举例说自己曾因为读了林纾的翻译小说后“真觉得心痒难搔，恨不能知道原文”究竟是怎样的，<sup>③</sup>于是林译小说在无形中培养了他阅读外国小说原文的兴趣，也实现了翻译文学应担的“媒”和“诱”的责任。

因为钱锺书先生认识到译文的作用是诱导读者去阅读外国原文，只要能发挥“诱”的功效，译文便在译入语国语境下具有存在的必要性。正是如此，钱锺书虽然对翻译过程和译文设置了几乎难以企及的标准，但不能达到此标准却可引起读者对原文兴趣的译文依然值得肯定，哪怕是错误百出的翻译。晚清的翻译“其实包括了改述、重写、缩译、转译和重整文字风格等做法。严复（1853~1921）、梁启超（1873~1929）和林纾（1852~1924）皆是个中高手。多年以前，史华兹（Schwartz）、夏志清和李欧梵就曾分别以上述三人为例证，指出晚清的译者通过其译作所欲达到的目标，不论是在情感方面或者是意识形态方面，都不是原著作者所能想象得到的。”<sup>④</sup>但钱锺书先生在谈林纾翻译的时候，对林译的“遗漏百出”、“加油加醋”、任意出现的“比喻”或“增补”等“讹”的现象不但没有加以严厉的指责，反而罗列大量的译例为其“不忠”的行为开脱，因为“恰恰是这部分的‘讹’起了一些抗腐的作用，林译多少因此而免于全被淘汰”。<sup>⑤</sup>忠实与否对翻译文学而言并不是其在译入语国获得生命力的主要原因，读者才是衡量译文的

有力标尺，《域外小说集》的销量说明了周氏兄弟忠实的译本反而没有获得成功。鲁迅回忆说：“当初的计划，是筹办了连印两册的资本，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册的。……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至于上海方面，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sup>⑥</sup>为什么忠实的译文反而比不上讹化的译文传播广泛呢？鲁迅为什么没有超越林纾译本赢得更多的读者，而且连“卖回本钱”的愿望也落空了呢？这多少印证了钱先生所认为的“讹”可能激起读者对外国文学兴趣的观点。“五四”以来的很多作家和翻译家都受到了林译小说的影响，从而对外国文学发生了兴趣，这与林译本所起的“媒”或“诱”的作用分不开，假如林纾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味地注重忠实而忽略了译文的可读性，则很多人不会像周作人那样发出“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sup>⑦</sup>的感叹，也不会建立起阅读外国文学的兴趣。当然，钱锺书赞同翻译的“讹”是有限度的，是以能引起读者兴趣为原则的，如果译文过于远离原文甚至出现指鹿为马的讹错就不应得到宽恕了。

事实上，所有的文学翻译非但没有做到实在的“忠”，反而带有虚假的“讹”，钱锺书先生深谙此理却提出了“化境说”和“媒诱说”，实则表明文学翻译永远行走在朝圣的路上，为读者与外国文学缔结姻缘。不过，许多看似逻辑严密甚至攻不可破的翻译理论极易被“很不合学者们的理想和理论的事例”给瓦解，恰如钱先生所说：“在历史过程里，事物的发生和发展往往跟我们闹别扭，恶作剧，推翻了我们定下的铁案，涂抹了我们画出的蓝图，给我们的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理论系统糊上大大小小的窟窿。”<sup>⑧</sup>万仞万理自有其道，唯实践论之方得英华，钱锺书的文学翻

①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98页。

② 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质文》月刊（2卷2期）1936年11月。

③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00页。

④ [美]王德威：《翻译“现代性”：论晚清小说的翻译》，《想象中国的方法》，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2页。

⑤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07页。

⑥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译文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⑦ 周作人：《〈点滴〉序》，《知堂序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⑧ 钱锺书：《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新华文摘》1982年第4期。

译思想也不例外。

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研究生导师、  
博士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西南大学

责任编辑：马 光

## Literary Marriage on the Road of Pilgrims: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Qian Zhongshu

Xiong Hui

**Abstract:** The translation theory of Qian Zhongshu is embodied in two aspects, that is, sublimation theory and media temptation theory. The former sets the highest level for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he highest standard for translation version, thus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translation in the end; while the latter emphasizes the function of translation is to arouse the readers' interests in foreign literature, thus promoting the exchange of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nd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The two theories are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but in fact unified and harmonious, and both are reasonable translation theory.

**Key words:** Qian Zhongshu; literary translation; sublimation theory; media temptation theory

### 观点选萃

## 怎么画也画不成的圆

孙 伟

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孙伟认为：刘震云的新作《我不是潘金莲》，描写了农村妇女李雪莲为了维护生命尊严而倾其所有时间、精力，坚持 20 年上访的故事。阿 Q 因为在画押时没有将代表姓名的圆圈画得圆满，到死都无法释怀。《我不是潘金莲》讲述的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为生命寻“圆”的故事，开拓了描写当下农村女性追寻生命尊严的题材。她们不仅要衣食无忧地活着，更要有尊严地活着。当这一问题被抛出来之后，它就像一块试金石。通过李雪莲长达二十年的上访，在与大小各级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暴露出了农村女性在经济、法律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双重弱势地位。李雪莲与丈夫假离婚，结果被他欺骗，成了真离婚。她咽不下这口气。虽然决定不再和秦玉河过下去，但仍要坚持和他再结一次婚，然后再离婚。她要在这个过程中把做人的尊严找回来。但她这样的想法却被周围的人看作是“瞎折腾”。

刘震云在新浪视频接受采访时，一再提到“逻辑”这个词。他认为中国人很容易将一件事演变成另外一件事，一个芝麻变成一个西瓜。这背后体现出的是生活逻辑乃至思想逻辑、哲学逻辑的荒诞。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李雪莲的故事只是一个序言，是被她告状罢官的史为民县长的故事展开的序曲。史县长因为“上访”事件免职，结果又因为假扮“上访”人员而避开春运高峰由专人送回家。“序言”和“正文”两个故事的呼应，就成功显示出了作者所要表达的生活逻辑的荒诞。生活本身就很荒诞，作家又以荒诞的小说形式表现这种荒诞，本该是“正文”的成了“序言”，本该是“序言”的成了“正文”。用农村妇女李雪莲大半生血泪斑斑的告状史换来免职后史县长回家的一张免费车票，这样名之曰“玩呢”的生存智慧本身也是生活逻辑“荒诞”的一种表现吧。

与《一句顶一万句》比起来，《我不是潘金莲》少了人间的烟火气，多了戏剧性的场景和情节。作者有权处理笔下的人物和情节，但如果少了对他们悲欢离合的深情关注，那么所要表达的主题也不免空洞。作者笔下的人物不仅仅是表现主题的符号，更是人世间有血有肉的鲜活的生命个体。比起作者所要表现的荒诞主题，那个用尽所有努力为生命的尊严画圆的李雪莲更值得人们关注。

(马光 摘编)